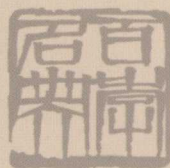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科学概论

王星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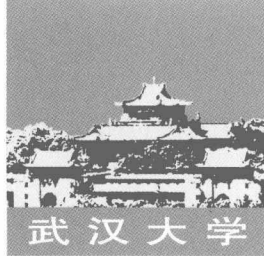
根燠葉茂
實亦聲滋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N0/5

2008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科学 概论

王星拱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概论/王星拱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5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06210-8

I. 科… II. 王… III. 科学哲学—概论—中国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947 号

责任编辑:杨 华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1.5 字数:160千字 插页:4

版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6210-8/N·18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王星拱

(1887~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安庆市高河镇凌桥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化学，1916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理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学成归国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在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8年，与李四光等著名学者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在武汉大学期间曾一度兼任安徽大学校长。1945年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

王星拱主政国立武汉大学12年，为国立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校西迁四川乐山，曾拒绝国民党在校内建立区分部，并保护进步学生，支持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7年中山大学不少学生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反蒋游行示威中被捕，他多次向广州军政当局据理力争，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进步学生，遭拒绝后，王

星拱愤然离校，以示抗议，并在香港公开发表反蒋、反独裁、反内战讲话。

在哲学思想上，他深受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认同实证主义的经验验证原则，否认宇宙间有超自然的主宰力量，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以科学化、实证化为现代哲学的基础，对新的哲学形态建设作了潜心研究，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主要著作有《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再版说明

王星拱先生所著《科学概论》曾于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我社据其版改以简体新版，并力求保持全书原貌。同时将丁文江先生于该书1935年重印时增补的《序》收录其中。由于年代关系，原版中字、词、标点用法，人名、地名、学术术语等的写法、译法等具有其时代特征，与现代图书出版规范不一致处，均予以保留。再版仅对个别字词用法前后不一致及明显排版错误作了修改。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

再版前言

李维武

1930年，王星拱著《科学概论》，作为《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的武汉大学美丽校园中孕育出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总结性成果，不论是在武汉大学学术史上，还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和价值。在《科学概论》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重新出版的时候，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书中的哲学思想，我们在这里对王星拱的生平与思想及《科学概论》的要点与意义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王星拱：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哲学家

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化学，1916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理工大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王星拱不仅在化学领域学有专长，而且积极参与当时革新中国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尤其在教育生涯和哲学研讨中成就卓著，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与哲学家。

王星拱自青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于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归国后，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积极投身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既是同乡又是挚友，对陈独秀的进步活动予以了多方的支持和保护。他与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关系密切。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杀害，他因

之不得不携家离京南下避难，以后便留在南方，先后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

王星拱曾长期担任大学校长，特别是长期主持武汉大学，成为 20 世纪中国的著名大学校长和著名教育家。1928 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他与李四光、周鲠生、曾昭安等著名学者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工作，并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从此，他的名字、他的事业与武汉大学联在了一起。在武汉大学发展史上，他是继张之洞、王世杰之后又一个对武汉大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他来武大后，先后担任理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副校长、教务长诸职，并一度兼任安徽大学校长。1933 年，他接替王世杰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任职后，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主持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使一个美丽的大学校园出现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奠定了今日武汉大学主体建筑的格局，塑造了武汉大学的标志性景观；另一方面规划了武汉大学的未来发展，积极把武汉大学建设为中国名校，明确提出武汉大学办学的特点在于知识提高与人格培养并重。他说：“本来大学的目的是有两层：（一）知识提高；（二）人格培养。各国大学，对于这两个方向之注意，有轻重之不同。武汉大学对于这两点是并重的。”^①但随后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武汉大学的正常建设和顺利发展。1938 年，武汉大学被迫撤离珞珈山新校园，搬迁至四川乐山，在战时环境中继续办学。抗战八年，岁月艰辛，王星拱一直坚守校长岗位，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努力维持并发展学校，耗尽心血，功不可没。武汉大学能够在战火中渡过难关，生存发展，成为全国名校，是与这位校长的领导和努力分不开的。1945 年，王星拱调任中山大学校长，未能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珞珈山。王星拱虽长期担任学校领导，却始终是一个正派严谨的学者，公私生活一丝不苟，深受武大师生爱戴，被称为“清官校长”。在几十年后当年武大师生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位校长的人格风范备受推崇和怀念。

^① 见王星拱：《武汉大学所应当注重的精神》，载刘双平：《漫话武大》，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4 页。

王星拱又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著名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他同曾留学英国的严复、丁文江一样,深受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认同实证主义的经验验证原则,以科学化、实证化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正是这样,他拥护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树立的“科学”旗帜,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并参与1923~1924年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与胡适、丁文江一起成为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20年,王星拱著《科学方法论》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作为教科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方法论专著,在中国科学方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全书共分《现象界之复杂》、《或然之理论和他的测算》、《归纳的论理》、《现象的权量》、《错误之免除和减少》、《观察和试验》、《逼近之理论》、《假定之用法》、《知识之类别》、《综合和推较》、《类分》、《例外之应付》、《概括的结论》十三章,对现代经验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从一个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对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王星拱发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强调并放大科学方法(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作用,坚定地支持丁文江及他所代表的科学派。在文中,他认为科学所以构造的根据在于两个原理,一是因果之原理(Causality),另一是齐一之原理(Uniformity)。因果之原理是说,宇宙中之各种现象必定有因果关系,没有无因而至的,也没有不生效果的。齐一之原理是说,同因必生同果。这两个原理具有普遍性。“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①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把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各方面文章汇编成书,亦题名《科学与人生观》,王星拱的这篇文章也收入其中。这样一来,“科学与人生观”一名,就有了两个含义:一是指王星拱写的这篇文章,二是指亚东图书馆编的这部文集。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王星拱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以

^① 见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载张君勱、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

后，王星拱又著《科学概论》一书，对 20 世纪 20 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进行了系统总结，成为自严复以来 20 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这部《科学概论》，可以说是《科学方法论》的续篇，是王星拱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

王星拱作为集化学家、哲学家与教育家于一身的学者，十分重视大学教育中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贯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在《科学方法论》的《序言》中，他就表达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指出：“自从蔡子民先生到北京大学之后，大学里的各部分，都极力的要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段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两种人材，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试问我国教育之目的，能说不是要造就适应将来世界环境的人材吗？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自然要从各科的教学同时下手；但是我希望这一部小书，在这个大功业之中，也能尽他分内的力量。”^①在《科学概论》中，他从连续与无限、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力论述起，一直谈到科学与哲学、科学与美术、科学与伦理的关系，指出自然科学不只是面对自然世界的学问，而且是与人文世界相关涉的学问。可以说，他的《科学方法论》与《科学概论》，正是这种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王星拱作为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渊源颇深，在 1945 年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他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却承继了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所培育的治校精神，主张学术自由和思想包容，不赞成国民党控制学校。在他开始任武汉大学校长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就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者范寿康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课堂上介绍唯物辩证法，用唯物史观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教材《哲学通论》、《中国哲学史通论》，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出版。他对学校中的师生言行，甚至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也持较宽

^① 见王星拱：《序言》，载王星拱：《科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6 年版，序 1。

容的态度，保护和营救过不少进步师生。1948年春夏时期，随着中国政治局势出现巨大变化，担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王星拱与广东国民党当局的矛盾迅速激化，并在国民党最高层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文中称：“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分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巨。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①高压之下，王星拱被迫提出辞呈，告病还乡。1949年，当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崩溃时，王星拱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等待新中国的诞生，与国民党最终决裂。

1949年10月8日，王星拱病逝于上海。11月13日，武汉大学师生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的校园中举行追悼大会，深情祭奠这位为武汉大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好校长。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对这位著名的学者兼教育家予以高度评价，誉之为“一代完人”。

二、王星拱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

王星拱作为20世纪中国的著名哲学家，是与20世纪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相联系的。

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启始于严复；而至新文化运动及科学与玄学论战，形成了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这个哲学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推胡适、丁文江与王星拱。^②胡、丁、王的基本思路

① 转引自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页。

② 关于自严复以来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详见李维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第三章《科学主义思潮对本体论的探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6～162页。

是一致的，即通过对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论争，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否定形而上学，建设科学宇宙论，推动现代形态中国哲学沿着科学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丁文江在为王星拱《科学概论》所写的《序》中，引了两句话，一句是胡适所说的“哲学是假科学”，另一句是他自己所说的“科学是真哲学”，正可以概括他们的这一思路，看作是他们共同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即“哲学是假科学”；一方面是对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即“科学是真哲学”。这两个方面，一破一立，本是不可分割的。但具体到胡、丁、王三人中，对于这一纲领的贯彻却是互有区别、各有侧重的。

丁文江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最为坚决和彻底，其主张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鲜明而典型地表现出来。在这次论战中，丁文江激烈地反对玄学派为确立本体论存在的基础所作的努力，指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史，就是一个科学各部门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形而上学作为根本哲学，包罗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重大问题，但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各种科学部门相继独立出来，只剩下本体论这块地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出现了新的科学的哲学——科学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与正统派哲学的根据不同。”^①根据科学的知识论，感觉经验是证明物质是否存在的最根本的根据；离开人的感觉经验，不可能证明物质是否存在。这样一来，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超感觉经验的本体，就成为不可证明其有无的东西了。因此，形而上学终将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与存在价值。丁文江由此而断言：“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②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②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哲学活动，是他对于科学方法的大力倡导。胡适所讲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他始终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来解释、来宣扬。在他看来，实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加以改造的结果。在以往的经验主义者那里，经验只是依靠瞬息的、原子的、单独的感觉构成的，是被动的、守旧的、盲目的，因而又有理性主义者提倡理性，设置本体，用以综合、组织散漫的感觉经验。而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连贯而有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也就是生活，具有文化的意义。根据这种科学方法，胡适对传统本体论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既然经验就是生活，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去为分散的经验找一个统一的理性，设置一个绝对的本体。他强调用这种科学方法来研究宇宙人生问题，通过十个命题，提出了一套包括宇宙论在内的“科学的人生观”的框架^①，主张用这一框架来取代传统的形而上学。总的来说，胡适通过倡导科学方法，对于这个纲领的两个方面都有贡献，但这种贡献又往往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展开。

王星拱在哲学上与胡、丁二人相呼应，但他最有建树的，是在经验论基础上对于科学宇宙论的建设。这是丁文江、胡适所不及之处。丁文江所重视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一面，而很少顾及新的哲学形态建设的一面。胡适虽然提出了“科学的人生观”的框架，但这仅仅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论纲，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加以详尽地展开。王星拱则于倡导科学方法、参加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对新的哲学形态建设作了潜心研究，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这个体系在《科学概论》一书中具体地详尽地展现了出来。正是有赖于王星拱的《科学概论》，胡、丁、王的共同纲领才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他们对于科学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才卓有成就。因此，王星拱的

^① 关于胡适提出的“科学的人生观”框架，详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勱，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4页。

《科学概论》对 20 世纪 20 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科学概论》的哲学思路

在《科学概论》中，王星拱对自严复以来中国科学主义发展中、特别是对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所提出的主要哲学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探讨，由此而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并由此建构起一个相当完备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他的思考与探讨、阐发与建构，主要是沿着下面的基本思路而展开的：

第一，明确划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自科学与玄学论战始，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就被凸显出来，成为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论争的焦点，成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确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前提。王星拱在建构科学宇宙论体系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个前提，对此作了认真的探讨。他对科学与玄学论战的经验教训作了较深刻的反思，克服了胡适、丁文江乃至自己倡导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偏激情绪，认为科学与哲学是不同的学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进而指出，要实现科学与哲学的划界，单凭区分科学与哲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是不行的，而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为此，他把历史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列为两大类，一类是主张“哲学与科学之范围不同而其方法亦不同”^①，另一类是认为“哲学与科学之范围相同而其方法不同”^②。第一类主张又包括三种观点：（一）认为哲学是研究本体的，科学是研究现象的，如柏格森；（二）认为哲学是研究知识的，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如康德；（三）认为哲学是研究形式的，科学是研究实质的，如罗素。第二类主张也包括三种观点：（一）认为哲学在前而科学在后，如古列；（二）认为科学在前而哲学在后，如汤姆森；（三）认为哲学是全部的，科学是局部的，如笛卡儿。王星拱认为，通过这种种理论的考察与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共同

^①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10 页。

^②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20 页。

点，从而能大致确定哲学与科学的各自特点，这就是：“哲学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是偏重试验的；哲学家多用脑，科学家多用手。”^①根据哲学与科学各自的这些特点，就不难对两者作出明确的区分，说明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从而解决科学与哲学的划界问题。

第二，重申哲学发展的科学化、实证化方向。王星拱指出，哲学尽管与科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不能混同，但近代哲学发展的趋向只能是科学化、实证化。长期以来，由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不同，使崇尚哲学的人与崇尚科学的人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在崇尚哲学的人看起来，哲学精微，科学浅陋，哲学扼要，科学逐末。在崇尚科学的人看起来，哲学渺茫，科学切实，哲学武断，科学谦虚。”^②这两种看法似乎都有自身的合理性，但如果从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史上看，就不难发现，科学毕竟比哲学高出一筹。他说：“依历史沿革和近代趋势而言，哲学的历史甚长而进步甚缓，科学的历史甚短而进步甚速。因为哲学中的结论，没有切近的证明，所以易于发生辩论；科学中的结论，都是紧密依据于观察试验的，所以其所得的领土，虽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然而却不是朝秦暮楚，旋得旋失的。而且近代哲学，都有科学化的性质。这不是因为科学势力大了，而使哲学屈服于其下，是因为哲学在历史上所制造的虚浮无着的辩论，实在是太多了。拘迫过久，则思解放，紊乱过多，亦思秩序，于是我们渐渐觉得要多在耳闻目见的方面做工夫。”^③这就是说，哲学史与科学史都已表明：正是由于哲学离开了经验，使其理论无法证实，不能定论，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从而造成了哲学老大不前，发展缓慢；也正是由于科学立足于经验，使其理论能以证实，成为定论，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从而使得科学突飞猛进，后来居上。这就要求哲学一反自己的非经验的思辨传统，努力向科学学习，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哲学

①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0 页。

②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0 页。

③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0 ~ 231 页。

的科学化、实证化，就是要求哲学回到经验中来，摒弃无定论而常争论的形而上学追求，采用科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的性格。他说：“假使现在有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自己偶尔高兴，不管事实究竟如何，依随他自己的癖性建筑一个哲学系统起来，其立脚总是不稳固的。惟其因为立脚不能稳固，所以大家对于它也没有久远的信从，则此系统之摧毁，或者比此系统之建筑，还要容易。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哲学也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即具有科学的精神，方能成为哲学。二者之方法渐渐底要趋于一致了。”^①在这里，王星拱强调了哲学对于科学的依赖性，反对离开经验、离开科学方法来谈哲学的发展。他还指出，随着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来哲学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在宇宙方面凡哲学所应研究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研究，在人生方面，凡哲学所应解决的，都可以付与科学去解决”^②。

第三，重新定位哲学的作用。王星拱认为，这种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并不意味着哲学要变成为科学，由衰弱而渐至灭亡。他强调，面对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科学化、实证化方向，哲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明确指出：“哲学固然不能脱离科学而另有独立的存在，但是哲学仍然有它的合法行使的职权。”^③哲学的合法行使的职权在于：哲学是各种科学的合一、综合。他说：“哲学之和一各种科学，与各种科学之和一其范围以内的真理（即各种科学中之假定理论定律等等）一般。各种科学之和一，可谓低级的和一，哲学的和一，可谓高级的和一。后者之自然性，及其合法与重要，与前者相同，不过提高一层罢了。”^④这种合一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由于各门科学之间的界限太严，限制了彼此间的了解；而有一些重大的科学问题，不是一门科学所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若

①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1 页。

②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1 页。

③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1 页。

④ 王星拱：《科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31 ~ 232 页。